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促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质的巨变。在100年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在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文学在题材、内容、风格上面貌一新,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独特的创作汇入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征程之中。

党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在革命年代,党积极利用民歌、民谣等民间文艺鼓舞人民参与斗争。少数民族作家们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文学作品。特别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民间文艺、民族文艺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而最大的变化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茅盾在为《人民文学》创刊号起草的《发刊词》中,先后提到“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的文学”“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三个概念,此为“少数民族文学”概念之始。此文刊于1949年10月25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故1949年10月25日当是“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正式面世之日。

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郭沫若、老舍、钟敬文等担任领导,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被纳入其中。陶阳、刘锡诚等还亲自参与了民族民间文学的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工作首次得到国家机构的认可和领导。

1950年5月,乌兰夫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院长。9月,开办第一个藏文培训班,教学中使用了藏族文学资料,可视作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萌芽。1952年中央民族学院语文学系成立,标志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诞生。

1955年“五一”劳动节之后,中国作协副主席、满族著名作家老舍代表中国作协邀请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彝族、侗族、东乡族、苗族、朝鲜族、汉族的14位同志座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问题。这次座谈涉及“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的兴起”“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翻译问题”等几个方面。

1956年2月27日,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学问题。

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座谈会,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代表出席了会议。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就已编写出版了《白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藏族文学史》《广西壮族文学》等。

1961年3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北京、新疆、云南、贵州、黑龙江等地7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到会讲话。4月17日,何其芳就讨论会情况作总结报告,后整理刊于《文学评论》1961年的第10期。会后形成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编写出版计划》等文件。

1978年冬在兰州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会议是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第一次规模盛大的聚会,它对全面开展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研究起了动员和组织作用。这次会议后,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编辑出版了高等院校教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选》(马学良主编)。这是全国第一部包括55个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选集。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文化底蕴和发展历史,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和情感表达方式,这是我们的民族之根所在。如果丢弃自己的根,那我们的创作就会失去重要保障,这既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也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丰富性让文学创作辽阔无边,特色性让文学作品引人注目。而丰富性和特色性恰恰是少数民族写作者最占优势的地方。因此,我们应该扎根于自己的民族,从中吸取养分,开辟属于自己的创作疆土。这样,一方面可以找到自己在创作上的根基,另一方面可以展示本民族的发展成就。

现在各个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空间都扩大了,眼界也开阔了,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已融入时代潮流,这就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全新和宽广的领域。好的文学作品总是给人温暖、力量和光明。文学创作除了记录和呈现,还要给生命找到出口,给心灵带去春风。全国各民族同胞在促进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反映广大民族同胞生活面貌和奋斗精神的少数民族文学的作用不可忽视。

都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这是有前提的,不是所有民族的都是世界的,只有超越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有些少数民族写作者,虽然立足于自己的民族,写出了很多作品,都可反响平平,难以走进,没有被更多的读者接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所写的作品没有超越民族,太自我。我们都知道,资源优势并不等于创作优势。少数民族写作者拥有很大的资源库,可往往缺乏好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对繁多的写作素材不懂得取舍和提炼,对情感的呈现和思想的表达过于单一,对故事的讲述过于老套。世界上杰出的作品必有独到之处,大到谋篇布局,小到细节安排,

党的领导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梁庭望(壮族)

1979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昆明召开第三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宁夏、广西、广东、湖南、福建、内蒙古、黑龙江、吉林15个省份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央民族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的代表,会上决定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况》一书。

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同时召开第一届年会。这个学会是专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在全国发展会员并定期召开学术年会和专题学术讨论会,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设贡献了力量。

197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贾芝任所长。这是国内首次成立国家级的民族文学研究机构。该所下设理论研究室、《格萨尔》研究室和多个地区的民族文学研究室,出版专门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季刊《民族文学研究》。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的社科院也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这样,就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

1980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随后举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1981年,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国性刊物《民族文学》。这些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秀迅速成长起来。

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下,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语文学系建立了语言学、藏语族语言文学、壮侗语族语言文学、苗瑶语族语言文学、蒙古语族语言文学、突厥语族语言文学6个硕士点,这是中国的第一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点。1983年,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藏语族语言文学博士点,这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点。

1984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搜集工作的通知》出台。自此民族文学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扬帆远航,熠熠生辉,中华多民族文学融为一体。

1980年代所奠定的这些发展机制,为少数民族文学在90年代、新世纪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近些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优秀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涌现。

少数民族文学的崭新面貌

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文学脱胎换骨,形成与时俱进的新文学,面貌焕然一新。

第一,文学题材更趋多样化。在过去,由于经济的落后和交通的阻隔等原因,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往往偏居一隅,各自从传统的农牧生活中选取题材。牧民歌颂草原的骏马牛羊,哀叹封建统治下牧民生活的困顿。有些地区还处在封建农奴制的残酷统治下,反抗这一制度成了文学的主题。这些文学题材正像藏族诗人饶阶巴桑在《太阳——献给农奴出身的歌手》中所写的:“我早就向天空邀过:要和它交换一件商货,把我的痛苦都给它,那是奴隶强加给我。//陨落的星星填满了河,老天一直没有来收买,也许它已经远远看见:我的苦大也太多。”在华南,壮侗语族民族喜欢民歌,而民歌的题材大多来自苦歌和情歌。以民歌格式演绎而成的民间长诗,则有创世

史诗、英雄史诗、抒情长诗、历史长诗、叙事长诗、散歌套歌、信歌、传扬歌、经诗、对歌等十类之多,但不不管是哪类长诗,题材都是来自民间的苦难和民族风情……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少数民族文学的题材也发生了重大转换与更新。作家们从党领导的革命进程里选材,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汲取创作灵感,从当下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中激发创作活力,使民族文学的题材、内容更加多样化。

第二,文学结构的变化。在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学以民间文学为主,因为创作力量的匮乏,一些民族的作家文学长期处于空白状态。我们知道,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创作,要么使用汉语,要么使用少数民族文字。遗憾的是,在那一历史时期,拥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民族并不太多。即使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字,很多作家也是能说不能写。由于教育尚未普及,能自如应用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也不太多。因此,少数民族文学的结构,长期以民间文学为主,结构比较单一。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事业有了巨大发展,各民族都产生了掌握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的知识分子,其中便出现了作家和诗人。现在,我们查阅每年发展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名单,少数民族作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每个民族都有优秀的作家涌现,并以各自优秀的作品获得了全国性的奖项,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活跃态势。因此,民族文学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作家文学远远超过民间文学,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

第三,各民族文学同频共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各少数民族作家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鼓与呼,使各民族文学有了共同的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文学的内容上,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新人新事,歌颂创新创造,成了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主旋律。特别是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够自如应用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蜂拥出现,能够将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进行自由转换的双语作家、翻译家也越来越多。这就使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文学互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学。这促进了中华各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也有利于以文学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四,文学功能得以扩展。传统文学的主要功能是抒情,控诉压迫剥削,为民众提供艺术欣赏的对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踊跃投入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之中,并把民族文学从民间抒情变成斗争的武器,批判剥削制度,揭露剥削阶级罪恶,反抗帝国主义侵略,鼓舞斗志,激励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冲锋陷阵,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作家们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改革开放,鼓舞各族人民奋起直追,使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总之,使民族文学功能转换,成为革命和建设的有力助推器。

第五,文学风格变得高昂。文学不再是传统的悲歌。新的民族文学语言顺应了时代变化,用语明朗,格调清新,风格昂扬,有着催人奋进的力量,洋溢着必胜的激情。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创新成为主旋律。就是传统的情歌,在新中国文化氛围下风格也不一样。壮族有一首情歌叫《十赞后生歌》,脱胎于传统民歌,但风格经过精心改造,明朗的时代氛围格外浓郁,设喻格外清新。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在《为了你,我亲爱的祖国》中唱道:“爱的烈焰燃烧在我

年轻的躯体里,如此焦渴,我愿把一切献给你。/为了你,哪怕要蹈火海,忍受千般折磨,/炼狱之火不能将我焚毁,而会狼狈退避。//……我的心愿就是为你分担一切忧患和痛苦,/与你一道欢笑,共庆每一个辉煌的胜利。”类似这样风格昂扬的作品在少数民族文学中不胜枚举。

10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题材、结构、内涵、功能、风格的上述变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结果。文学作为文化战线的一部分,其功能的变化是先行,功能变化必然牵动题材、结构、风格的变化,使民族文学面目一新。

壮族文学的发展和新可能

在全国人民热烈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大喜日子里,民族文学界正在和整个中国文学艺术界一起,总结过去,展望未来,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找新的亮点,创造更加光明的未来。作为壮族人,作为壮族文学的研究者之一,我不禁想起百年来的壮族文学发展进程及其新可能。

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壮族文学从建党初期起就开始实现内容的更新和功能的转换,这源于壮族革命者韦拔群的有意运用。韦拔群在右江地区整整活动十年,组织妇女民歌宣传队,利用壮族民歌形式宣传鼓舞群众,自己也创作了上百首壮族民歌。1981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Fwen Bazgoh》(拔哥山歌),收入仍在流传的韦拔群创作的79首作品。在韦拔群的引领下,壮族文学遍地开花。后来搜集出版了《东兰革命史歌》《右江革命歌谣》《壮族民歌选集》《壮族民间歌谣资料》《红旗出山林》《邕宁抗日歌》等民歌集,以及大量民间故事。

在党的领导下,壮族的作家诗人队伍中出现了创作尖兵,他们是共产党员,以文学为武器同反动派斗争。比如,高孤雁、韦杰三等革命烈士,万里云、陆地、黄青、华山、蓝鸿恩等作家。这些知名的党员作家,参加革命斗争,以自己的作品奉献社会,带动了一大批壮族年轻人的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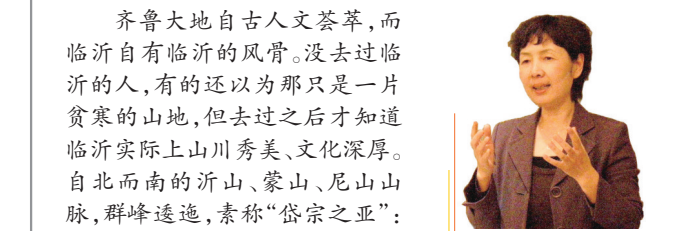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陆地、韦其麟的带领下,壮族出现了与时俱进的作家群。万里云、华山、黄青、蓝鸿恩、周民震等老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引领了壮族文学的发展。韦一凡、韦启文、潘漪、冯艺、黄凤显、黄佩华、凡一平、潘红日、严风华、李约热、钟日胜、陶丽群等作家的作品在不同时期展现了广西壮族文学的创作活力。当然,还有众多在广西区外生活的壮族作家,他们同样以自己的优秀作品丰富着壮族文学的园地。

与此同时,用壮文写作的作家、诗人也越来越多。几十年来,壮族母语作家们在《广西民族报》壮文版、《三月三》壮文版上发表了许多优秀的壮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这些作者绝大部分是民族语文工作者和学生。其中比较有名的有蒙飞、覃祥周、陆登、余执、滕朝强、钟希增等,他们成为壮文创作队伍中的活跃者。其中,蒙飞、黄新荣的壮文长篇小说《节日》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站在新的起点,壮族文学和全国其他各民族文学一样,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已经展开,为写作者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如何从现实生活中发现艺术的灵感,提炼出鲜活的人物形象和动人的文学语言;如何在坚守民族性与不断增强作品现代性之间保持平衡,创作出具有鲜明时代性的作品,是摆在少数民族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都是很讲究的。我们不能丢弃自己的民族之根,但也不需要总是强调和突出自己的民族身份,读者的阅读选择一般都是以作品的质量而定,与其他附加的东西没有什么关系,包括民族身份。作为少数民族写作者,我们要正视自己的民族身份,不要有优越感,也不要自卑感。在坚守一些优良传统和品格的同时,应该走出狭隘的一面,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融入创作中,努力写好作品。写出好作品才是正道。作为一名地道的白族人,白族文化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但在写作中,我力求让自己的视野变得开阔一些,将人性和人性作为我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不管内容涉及哪个方面,都是如此。白族历来是包容性很强的民族,对好的东西都兼收并蓄,当然也不丢失自己的民族风格。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打破单一性和局限性,就算对自己民族的书写和表达,也力求做到大格局、大情怀、大境界。其实,写作者不是少数民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定高度的理想,如果只囿于个人的一己悲欢,只抒发没有多少意义的小情小调,只关注窄如墙缝的小世界,那是没有担当的表现,写出的作品也不可能对广泛的社会产生影响,更不可能触动读者的内心。这几年,我给自己的写作重新定位,努力去挖掘和呈现人类共性的东西,让灵魂飞得更高远。在守住民族之根的同时,如何把生命的枝叶更好地伸到世界的广阔蓝天,也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不想墨守成规,也不想做背叛者。我想超越,超越自己,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时空。当然,这只是我的理想,需要我通过自己的创作,一步步地去践行。



新视野

临沂的风

□叶梅

齐鲁大地自古人文荟萃,而临沂自有临沂的风骨。没去过临沂的人,有的还以为那只是一片贫寒的山地,但去过之后才知道临沂实际上山川秀美、文化深厚。自北而南的沂山、蒙山、尼山山脉,群峰逶迤,素称“岱宗之亚”;又有沂河、沭河、中运河牵动千余条水势丰沛的大小支流,贯通于山地之间,造就了中华大地上南北交融的一片绝美风景。

据史载,临沂古称琅琊、沂州,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发祥地,自西周以来已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曾诞生过曾子、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等历史名人,而临沂不仅是红色历史文化的承袭地,并成为首批中国书法名城,获评首批国家物流枢纽、中国十佳生态宜居典范城市、世界滑水之城、联合国绿色工业平台称号等。我所结识的临沂朋友无不为自己的家乡而自豪,他们对家园的喜悦洋溢于言谈与文字之间,王刚便是其中之一。

我对王刚的了解,有些来自平日与他及临沂朋友的交往,而更多来自他那些动情的文字,近日读到他的散文集《月是故乡明》,更为真切地感受到这位临沂之子的心路轨迹。

王刚的人生经历颇为传奇,他出生于苏州,但自幼被人抱养至临沂,在养父母家长大,受到沂蒙这一方高天厚土的熏陶。“1969年冬季,我从姑苏江南辗转来到山东沂蒙。沂蒙蒙的父亲姓王,母亲姓张。半百之年的父母,对我倍加珍惜。虽然生长在亲老家贫的环境里,我却受到了超乎常人的关爱与呵护。”在王刚的记忆里,父亲能干、智慧幽默,母亲慈爱、勤劳坚韧,两位临沂老人的抚育使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儿子体味到了天地间最温暖的亲情。从小到大,养父母的恩德渐次融入到他的血脉之中,他从骨子里成为了临沂人。

言谈中王刚常说,“俺的家乡沂蒙山,俺的家乡是块宝地”。他用亲身所见所闻,在一篇文章里历数家乡的变化,赞美家乡的人民,特别是闻名华夏的吃苦耐劳、忠厚善良、知恩必报、敬业爱国的沂蒙精神。他的家乡不光有好山好水,更有对他恩重如山的养父养母,同甘共苦相守多年的爱人、兄弟姐妹,敬重的老师、朋友。他浓墨重彩地书写他们,点点滴滴都是情。“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王刚以对家乡临沂的挚爱,成就了这本散文集的灵魂。

“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生长于齐鲁大地的王刚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仁义、忠孝在他少年时的心灵里便生根发芽:“我年少时最大的苦楚就是,面对病中老母亲的痛苦呻吟而无能为力。我期待尽快考上大中专学校,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他考上大学后,所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帮母亲治病,唯恐“子欲养而亲不待”,居然一边上学,一边在城里租了房屋,将母亲接到了身边,与女友一起共同照顾生病的母亲,让老人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养父母的仁慈和他的孝敬化作了这本散文集里的感人篇章。而多年之后又因他的行孝之心,奇迹般地找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当年母亲因为某种不得已的原因而舍弃了初生的他,几十年之后的母子重逢,让他们抱头痛哭而泣,感恩人生失而复得的极大幸运。

王刚的散文是十分真诚的自述,他写到与妻子的相识相爱,到夫妇相偕创业拼搏的伴件往事,于河水涓涓的日子里留下人生跋涉的一步一个脚印,以及始终不断的脉脉温情。让人感动的是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王刚不仅没有忽略妻子的付出和辛劳,而且常常自省,体谅妻子悉心面对的“是我这样一个沉迷于世俗事务中不能自拔的男人,一个善良热情关爱他人看似精力充沛却时常精疲力竭的人,一个奔波在商场上却有着难以割舍的文人情结的人,一个只顾耕耘眼前不问来生收获、祈求身体健康却懒得锻炼身体的人。”他站在妻子的角度,反思自己的不足,以此来弥补夫妻间的缺憾。他写到有一次小兒发烧,不在身边的妻子遥控指挥到每一个细节,结果让儿子化险为夷,这让他感佩不已。他记录下妻子的“训示”:“为人子,不知医,不能称为孝;为人父,不知医,不堪名为慈。”从他的笔下,可以感觉到那位聪敏的女子,或许,只有在懂得女性的男人眼里,女性的美德才会得以展示。

王刚的笔触沉浸于亲情浓郁的故乡,同时也伸向了远方,那是他人生航道的重要港湾。20多年前他随着中国开放的脚步踏出国门,闯荡于世界各地,用临沂人的勤奋勇气和仁义诚信,获得了人到中年之后的成功。在他经历过许多非同寻常的艰辛困惑之后,仍然难能可贵地保留了故乡温暖善良的底色,即便是写到曾经的酸涩,也总能化作足以回味的橄榄。他在与素不相识的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群交往之间,即便是萍水相逢也能透出一缕温馨,一种仁爱,显示出孔孟之乡的厚道民风,他深爱的家乡临沂之风。

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世界正逐渐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地球村,无数人从故乡去到远方,追寻一个个人的梦想。王刚当年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国外,如今又回到临沂再次创业,既是他个人命运的变迁,也可以折射出当代无数乡村青年的命运。值得借鉴的是,王刚并没有将城市与乡村、远方与故乡对立起来,他在《月是故乡明》的前言后记中,一再强调“一个游子对根的诉说”。他以他的追求和情怀将一切拥抱,远方有他的梦,故乡是他的根,没有根的梦就如浮萍,而有根的梦则带来更多的勇气和憧憬。

王刚的行文就像与知心朋友交谈一样,倾诉着自己的悲欢,语言质朴真诚,没有故作高深,伴随着丰富的人生阅历所获取的经验与思考,同时含有朴素又令人遐想回味的哲理,相信会带给走向远方而又心怀故乡的青年读者以启示。王刚以感恩之心说自己常常得到命运的眷顾,其实幸运并不总是偶然的,幸运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而他的准备或许很早就开始了,并显然来自他从小长大的这片厚德载物的土地。他以他的人生和书写表达出一种更为博大的心愿,期盼人与人之间、族群之间减少隔阂与误会,以爱心代替仇恨,以健康替代疾病,愿人间有更多的安宁幸福。